

日本漢字流通的成立過程

出野文莉(張莉)

摘要

本文是論述關於日本列島漢字普及的過程及其歷史。從 57 年賜予倭國王的金印、3 世紀《魏志·倭人傳》的記載、中國帶來的鏡上的漢字來看，多處可見倭人知道漢字的想法。也有從應神天皇的時代王仁帶來《千字文》和《論語》、《宋書·倭國傳》記載順帝昇明 2 年(478)倭王武送呈出色的上表，有提倡倭王武熟知漢字的說法。但是至 7 世紀《隋書·倭國傳》中，關於日本列島的文字使用狀況記載有「無文字、唯刻木結繩」，筆者認為這是隋朝遣使看到的實際狀況。因為隋朝的遣使和處於倭國的代表人物經常接觸，對於倭國的漢字使用狀況瞭如指掌。

6 世紀佛教從百濟傳來，隨著佛教經典的流入，為了理解佛教需要學習漢字。這樣的情況成為日本列島漢字的導入時期。610 年高麗僧曇徵渡來並製作紙墨，但是當時如何學習漢字，在文獻還是考古學方面都沒有證據，因此不明。

之後 7 世紀中葉出現了木簡的出土文物。這是官員處理事務使用漢字，筆者認為這可以看出日本列島漢字普及的痕跡。之後藤原京、平城京出土了大量木簡。至 8 世紀編纂《古事記》《日本書紀》，日本列島的漢字熟練水平提高。不久簡化漢字製作假名，產生了以音表記和訓表記日語的獨自的漢字的使用。筆者認為其基礎是在 6 世紀至 7 世紀中葉建立的。

前言

漢字從中國傳到日本，是怎樣普及、如何變遷的，是筆者一直感興趣的課題。在此試論述日本人如何熟練掌握傳到日本的漢字，探討其變遷過程。

日本存在 3 世紀已經有一部分日本人熟練掌握漢字的想法。漢字確實是《魏志·倭人傳》中記載的卑彌呼(3 世紀中期)時代傳到日本的。但是能夠理解漢字的人是，來日的中國人或者韓國人及認識少數漢字的卑彌呼附近的人，漢字沒有得到普及。當時的漢字對於卑彌呼周圍的人來說是怎樣程度呢，大概只能理解少數漢字之意。

636 年成立的《隋書·倭國傳》記載「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是指佛教推廣文字普及。佛教傳來的同時僧侶不讀解經文佛教就不能得到普及。木簡等書寫工具的毛筆、硯台的出土文物證明是 7 世紀之物。筆者認為文字的流通是以這些出土文物為證據，在此之前日本列島沒有流通文字。本文試考察 7 世紀之前日本列島漢字的流入狀況，同時探討文字流通歷史的成立過程。

一. 日本文字的考古資料

1 世紀至 7 世紀初的代表性資料列舉如下:

時代	文字的歷史(●從大陸傳來之物。?是不明之物)
彌生時代	1 世紀 ●寫有「貨泉」的貨幣 ●「漢委奴國王」金印(福岡縣)

	57年		
	2世紀前半	室見川銘板(125年)	
	2世紀中葉	●南種子町廣田遺跡的貝札(隸書的山字) ?大城遺跡的刻書土器	
	2世紀後半期	●東大寺山古墳的「中平…(184-189)」銘鐵劍(奈良縣)	
	3世紀中葉	《魏志·倭人傳》卑彌呼、邪馬壹國 「鏡」的簡化字的刻書土器(福岡縣三雲遺跡)	
古墳時代	4世紀初葉	木製短甲破片「田」的墨書(熊本縣柳町道跡)	三角緣神獸鏡
	4世紀前半	「田」的墨書土器(三重縣松阪市嬉野町片部遺跡)	
	369年	●石上神的七支刀銘(奈良縣)	
	5世紀中葉	「王賜」銘鐵劍(千葉縣荷台1號墳)	
	471年?	「辛亥」銘鐵劍(埼玉縣荷瀧山古墳)	
	478年	《宋書》記載的倭國武的上表	
	5世紀末?	江田船山古墳出土鐵刀銘	
	503年	●隅田八幡宮傳來的鏡	
6世紀	岡田山1號墳出土的「額田部臣」銘大刀		
飛鳥時代	607年	《隋書·倭國傳》「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	
	615年	法華義疏(冊頁)	
	622年	法隆寺釋迦三尊像後背銘	

從此一覽表來看，至7世紀初，生活、政治中幾乎沒有使用漢字。漢字作為生活工具使用是7世紀以後。

二. 金印「漢委奴國王」的「委奴」是「倭人」之意

筆者認為金印「漢委奴國王」的「委奴」是「倭人」的卑詞。中國方面使用「委奴國」之語，難以承認是「大國」，把住在邊境的幾個國家合併為倭奴，視為「倭人」之國。《漢書·地理志》的「樂浪海中有倭人」也是不承認作為大國的「倭人」集團的意思。《魏志·倭人傳》「倭人條」也是和上述「委奴」同樣構思的表達。因此，《漢書·地理志》的「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的「倭人」、金印「漢委奴國王」的「委奴」、《魏志·倭人傳》「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的「倭人」，三者是同樣的意思。即「委奴」=「倭人」。

「委奴」是把百餘國合併的「倭人」的卑詞。中國方面把「倭人」視為統一一定地域的國家。《後漢書·東夷傳·倭》「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如此所見，後漢的光武帝與「委奴國」進行國交是有意義的。因此，「委奴國王」是對人的蔑稱「奴」附加在「委」字上，理解為「倭人之國王」的意思。《隋書·倭國傳》「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這是《後漢書》所見的安帝（106—125 在位）時朝貢的倭國王帥升。因為「倭奴」是對「倭人」鄙視的稱呼，「委奴」也完全是同樣的表達方式。《宋史》可見「倭奴國」之名稱。由此考慮，「奴」無疑是對「人」卑下之語的說法。即「匈奴」「胡奴」「委奴」「倭奴」「倭奴」的「奴」是對「人」的卑下用語，這些用語都是同樣的意思。

當時的日本列島國王看到漢武帝賜予的有文字的金印時，感想如何呢。也許是首先注目金的存在，看著凹陷的文字向翻譯詢問文字的意思，感到漢字的存在不可思議。對於漢字只是這種程度的認識吧。

三. 關於室見川銘板（福岡縣）

1. 室見川銘板

1948年7月末佐世保第二中學（舊制）的教師原末久先生下班在回家的路上，在室見川的河邊腳碰到一塊金屬板撿起來帶回家了。那塊金屬板在家保存了28年。給長崎縣中學教師岡村廣法先生看了，岡村先生看明白上面刻的文字，發現了「延光四年」四個字。這是公元125年，說不定這是有極高價值之物，這個想法在腦中閃現。岡村先生把金屬板上寫的文字內容畫了圖，寄到北京大學拜託鑑定真假。不是北京大學，而是中國歷史博物館，1975年9月11日寄來了回信。中國的鑑定是清朝人製作的文鎮。

岡村先生對這種解釋不能信服，繼續考究。不久，岡村先生的解釋得到長崎縣鎮西學院短期大學江源正昭教授的協助，得出了此銘板是漢王朝賜予倭國王之物的結論。

銘板內容如下：「高暘左 王作永宮齊鬲 延光四年五」
發現了寫有「高暘左」的周代「銅戈」，「鬲」是從新石器時代至戰國末期所見的石器、青銅器，漢代時不使用了。有三條腿，中間放水，上面放甑點上火，用開水蒸穀物等。青銅器在祭祀時也作為儀器使用，上述的「鬲」也是儀器之意。

東方日出之處稱為「暘谷」，「高暘」是指「暘谷」（湯谷）。從天子面向南稱江東為江左的表達來看，「高暘左」即是「湯谷（扶桑之國）」。但是，這種情況必須弄清「倭人之國」和「湯谷（扶桑之國）」的異同。經常發現把「倭人之國」和「湯谷（扶桑之國）」攙雜考慮的書籍，「倭人之國」是現實之國，「湯谷（扶桑之國）」是傳說中的理想之鄉，兩者不同。「倭人之國」和「湯谷（扶桑之國）」在概念上要加以區別。以中國的洛陽為中心，其東側有「倭人之國」，再往東側有「湯谷（扶桑之國）」。當然有「倭人之國」離「湯谷（扶桑之國）」較近，接受其「德」的想法。孔子憧憬之國、徐福奉告秦始皇有不死之藥的國家、東方日出附近的神仙之國、即「湯谷（扶桑之國）」。因此，室見川銘板的「高暘左」是離「暘谷」（湯谷）最近的國家之意。「王作永宮齊鬲」的「王」是指九州列島的王。

如果那時代帥升活著的話，「王」指的是帥升，如果不是帥升的話，就是指繼帥升之王。「齊鬲」的「鬲」是祭祀的儀器，相當於「問鼎輕重」的「鼎」，完備國家的祭祀方法之意。「鬲」在漢代已經不被使用了，所以「齊鬲」不是實際上完備「鬲」的意思，而是以「鬲」作為比喻的表達方式。

2. 「室見川銘板」時代的認識

「延光四年」(125年)是後漢安帝時期，此年3月安帝駕崩，4月少帝繼位，少帝此年10月駕崩，11月順帝即位。「延光四年五」大概是延光4年5月，正是少帝繼承王位的時期。安帝是後漢第6代皇帝，106年—125年是在位期間。《後漢書》：「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可見安帝、少帝對在九州的日本列島倭人之國有一定的見識。

由這些筆者推測，「室見川銘板」的原形是安帝駕崩後的漢王朝通過樂浪郡賜予九州之王之物。此銘板大概是漢朝或者樂浪郡製作的。大概是奉承倭人之國，皇帝從安帝至少帝繼位後也跟以前一樣，漢朝庇護九州的倭人之王的意思。為安定統治樂浪郡，一定有必要站在九州的倭人之國一方。古代也一樣，政治總是有現實性的。在中國發現的刻有「高陽左」銘文的銅戈和刻有「永宮齊鬲」銘文的銅鬲，都是周代的銅器。「室見川銘板」是刻有這兩個短語的文書。這是漢王朝使用這些短語表面上向日本列島之王表示親愛之情，實質性的想法是強求恭順漢王朝之意。「室見川銘板」如果是漢王賞賜之物的話，也可以認為是在「延光四年」(125年)「室見川銘板」為少帝賜予日本列島的倭人之王之物。此王是永初元年(107年)安帝派遣使國王帥升等，或者是繼位的之王，家譜中之王。

3. 「室見川銘板」是日本列島製作的說法

有銘板是日本製作的想法(古田武彥 1926-2015 古代史研究家)，筆者認為此時代日本人製作這樣的銘板有些不合邏輯。後漢時代的《說文解字》創作時期隸書橫行，可以說當時用金文寫文章對於中國人來說也是在漢字方面具有很高修養的。「高陽左」「永宮齊鬲」是中國的故事，能夠活用文章也需要相當的修養。當時的日本人的漢字修養畢竟不可能吧。還有，從此銘板製作得不精細來看可以說是日本人製作的說法，但是此銘板不是完成得不好，而整體的設計非常完美。比之後的5世紀金石文的稻荷山古墳出土的鐵劍、江田船山古墳出土的鐵刀，漢字字形更加完美。另外，「室見川銘板」如果是出自日本人之手的話，之後也會製作同樣的銘板，但是此時代「室見川銘板」是唯一的，之後沒有出現同樣之物。日本列島銘板的出現要等到7世紀末墓誌的使用。如果只有一件出土、之後又沒有同樣系列的出土物，考慮是從其他之地帶來之物的想法比較妥當。如果是漢朝或者樂浪郡製作的話，此銘板的前後也製作有銘板，這才是自然的解釋。

《古事記》：「天降坐于竺紫日向之高千穗之久士布流多氣。」此「日向」不是宮崎縣而是福岡縣。古田武彥先生推斷「竺紫日向高千穗岳」的「竺紫」是福岡縣的竺紫，「日向」是福岡市西方至絲島郡的日向峠(山巔)、高千穗是高高突出的山岳之意、久士布流岳是福岡市和絲島郡之間的高祖山連峰中的久士布流岳。把「竺紫之日向」視為九州之日向是不正確的，「竺紫之日向」和地名兩段表示的情況下，肯定是竺紫地方的日向之意。「竺紫之日向」「久士布流峯」都是從室見川上流呼之可聞的距離。這一帶確實是初期九州王朝居住領域。從此地出土「室見川銘板」覺得很自然。107年朝貢後漢安帝時的國王帥升也埋葬在此地的可能性極大。

四. 土器和文字

當時本州的中國、東四國、近畿舉行銅鐸祭祀。銅鐸上描畫有鹿、龜、鳥、人、流水紋等圖案。沒有發現鑄造的文字。也就是說，日常生活中沒有使用文字。出土的許多古墳時代的土器上也描繪著和銅鐸同樣的繪畫、符號，有文字的極少。

現在的種子島南種子町廣田的彌生時代遺跡出土的貝札可見「山」字。這判斷為後漢末期的隸書，暗示了住在種子島的人們有到中國大陸會稽進行交易的可能性。此貝札大概是從中國帶回來的。三重縣津市安濃町內多的2世紀中期的大城遺跡，發現彌生式土器上似乎刻有文字。從線條的構成來看，可以考慮是「奉」「幸」「年」「寺」「與」等字，還不明確，但是可以判斷為文字。這是日本人、中國人、朝鮮的舶來人書寫的還不明確。文字不是文章，單數的文字應該有表示其意義的象徵。當時似乎還沒有把漢字作為文章使用的知識。

五. 關於《魏志·倭人傳》國名、人名的漢字記載

一「對海國」和「一大國」、「都市牛利」和「南昇米」

「對海國」和「一大國」是特殊的記載表現。其他表現國名意思的還有「侏儒國」「裸國」「黑齒國」。但是這些表現與「對海國」和「一大國」不同。「對海國」和「一大國」中的「海」「大」替換了音讀表現的「對馬國」「一支國」。本來是「對海國」「一支國」(「壹岐國」)，只替換了一個字。這種表記法是音讀和訓讀的混合表現，可以考慮是中國獨特的修辭方法。

《三國志·魏書高句麗傳》：「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迫擊之、為所殺。州郡縣歸咎于句麗侯驩、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于驩、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驩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佈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文章末尾的[下句麗]是王莽對高句麗的卑下之語。這種表現與「對海國」「一大國」是同種表現。「漢委奴國王」的「委奴」也是對「委(倭)人」的卑下之語，從音讀記載改變訓讀記載，屬於同樣類型。

由此可以考慮，「對海國」和「一大國」是中國人的表達，不是倭人的表達。可以考慮是，「對海國」是和朝鮮對峙之島、兼有「對馬國」之意的表達，「一大國」是「一支國」和兼有「大島或者人口多之島」的說法。「末蘆國」的後來的地名是「松浦」，這個「末」的吳音是「matsu,machi」，兩個讀音。「侏儒國」「黑齒國」不是音讀而是訓讀。這樣的各種表達可以看出記載的區別使用。

《魏志·倭人傳》中記載的倭名的人名如下：「難升米」「都市牛利」「伊聲耆」「掖邪狗」「載斯烏越」「卑彌呼」「壹與」等。其中「難」「米」「都」「利」「伊」「斯」「烏」「卑」「彌」「與」見於之後的萬葉假名。這些都是倭語，認為是來到倭國的中國官員記載的發音。

日本人的姓名何時形成還沒有明確。例如，「都市牛利」在《魏志·倭人傳》中只記載「牛利」，所以「都市」是姓。也許是職掌名或者地名。「難升米」，「難」是姓，「升米」是名字，或者沒有姓，「難升米」是名字，還不明確。「都市牛利」和「難升米」是當時的中國人使用漢字記載的姓名。筆者認為《魏志·倭人傳》中的記載全部都是中國人書寫的。因為是聽了倭人的發音而寫的，中國人記載的音讀、訓讀必然會產生。「都市牛利」的「都市」不只是音讀，是否包括訓讀還不能確定。

另外，還記載倭地名、職名的漢字音讀。可以看出魏代把漢字作為假借的音讀的應用方法已經

完備。《魏志·倭人傳》中使用的「伊、烏、支(甲音 ki)、吾(甲音 go)、蘇、多、奴(nu)、卑、不、馬、母(mo)、利」等，之後的萬葉假名也使用相同的發音。

《魏志·倭人傳》中的「邪馬壹國」，可以認為是《後漢書》李賢注「邪摩惟」。「壹」的異體字「夷」，小篆「夷」，此字的「壹」字中有「吉」字。「夷」充滿吉善之氣。《漢書》：「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這是對孔子憧憬的神仙之國的適當表現。之後的「邪馬臺國」的「臺」也和「壹」同樣包含「吉」字，帶有中國風味。關於「壹國」的讀法，「壹國」=「倭國」、「臺國」=「大倭國」的表音一致，筆者認為正確。

《魏志·倭人傳》：「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後漢書·倭傳》：「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在公元前108年滅衛氏朝鮮，置樂浪郡於朝鮮，日本列島與漢的接觸是從樂浪郡開始有了轉機。「使驛」的「驛」是傳送公文、往來官員住宿、換車馬之地。與「使驛」近似之語有「使譯」。「譯」《說文解字》三上：「傳譯四夷之言者。」，是翻譯四方異民族語言而傳播之意。此文的「使驛」可以理解為包括「使譯」之意。由此可知，在列島的倭人當中也有能做中國官員的翻譯人才。這樣的人才大概是從中國、朝鮮來到列島入籍的人。

日本人最初接觸漢字始於後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賜予倭國王「漢委奴國王」金印。根據《魏志·倭人傳》：景初2年(238年)、正始元年(240年)、正始4年(243年)、正始8年(247年)，倭國的使節往來於魏國首都洛陽、帶方郡。因此當然接觸中國文化、朝鮮文化中的漢字。

六. 關於稻荷山古墳出土的鐵劍

鐵劍的正面：「辛亥年七月中記。乎獲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埤、其兒多加利足尼。其兒名弓已加利獲居。其子名多加披次獲居。其兒名多沙鬼獲居。其兒名半弓比。」

鐵劍的背面：「其兒名加差披余。其兒名乎獲居臣。世世為杖刀人首、奉事來至。今獲加多支鹵大王寺在斯鬼宮時、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鍊利刀記吾奉事根原也。」

「獲加多支鹵大王」讀為「Wakatakeru」，一般說法以「大長谷若建名」(Oohatsusewakatakeru)稱雄略天皇。古田武彥先生把「今獲加多支鹵大王寺在斯鬼宮時、吾左治天下」讀作「今獲加多支鹵大王寺、在斯鬼宮、時吾左治天下」。把「斯鬼宮」視為檜木縣大前神社石碑的「磯城宮」，把「加多支鹵大王」視為住在關東之王。「磯城宮」離「稻荷山古墳」約20公里，埼玉縣南邊也有「志木」的地名。

稻荷山古墳鐵刀的人名漢字和萬葉假名的漢字讀法對比，如以下一覽表。

※上述萬葉假名一覽表中有的用○、沒有的用×、乙類的用(乙)表示。

乎 wo	獲 wa	居 ke		意 o	富 ho	比 hi	埤 ko		
○	×	○(乙)		○(乙)	○	○	×		
多 ta	加 ka	利 ri		弓 te	己 yo	加 ka	利 ri	獲	居 ke
○	○	○		○	○	○	○	×	○
多 ta	加 ka	披	次 shi	獲	居 ke		半 ha	弓 te	比 hi
○	○	×	○	×	○		○	○	○

多 ta	沙 sa	鬼 ma	獲	居 ke		加 ka	差 sa	披	余 yo
○	○	○	×	○		○	○	×	○
獲	加 ka	多 ta	支 ki	鹵					
×	○	○	○	×					

※「鬼」大體上是萬葉假名的「ま ma」，沒有確定。「鬼」萬葉假名是「ま ma」，「魔」的省略體，沒有使用「き ki」。因此，我認為「斯鬼」不讀「しき shiki」，有可能讀「しま shima」。

在此表中發現同音使用同樣的漢字。標記○符號表示在後來的萬葉假名中與稻荷山古墳鐵劍中使用同樣漢字的居多。這說明表音使用的漢字的選定在稻荷山古墳鐵劍的階段幾乎已經確定。《日本書紀·雄略天皇七年（463年）》中「新漢」（新舶來人）記載「譯語卯安那」舶來。把「譯語」理解為與國外的翻譯、公文的翻譯之意的話，也可以考慮「譯語卯安那」是攜帶字音表而舶來的。（岸俊男編《ことばと文字》日本の古代 14，中央公論社，昭和 63 年 3 月，406 頁參照）不只是根據「譯語卯安那」，相當於日語的「あいうえお aiueo」的音韻的漢字系列是那時引進的。

七.《隋書·倭國傳》記載的「無文字、唯刻木結繩」

《隋書·倭國傳》記載「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是指佛教推廣文字普及。佛教傳來的同時僧侶不讀解經文佛教就不能得到普及。一般地說來，與《隋書》編纂相關的魏徵、長孫無忌、顏師古、孔穎達等當然知道梁朝《宋書夷蠻傳》的倭王武的上表，不會有在倭國以前完全沒有漢字的認識。但是《隋書》的「無文字……」，這說明漢字在倭國以前國家的官吏、一般人，倭國社會中作為交流工具沒有使用。《隋書·倭國傳》中多利思北孤的描寫、十二等官位、五弦琴、阿蘇山的記述等，整體的內容真實，《隋書》是根據來到倭國的隋使的見聞所寫的內容，無疑表現了「無文字……始有文字」的記載也同樣是隋使的見聞的倭國的真實情況。

考慮倭國的漢字流入狀況，最初作為和中國、朝鮮的交流工具，使用了漢字。日本製造的鏡的相反文字如實反映了當時漢字的一般性普及程度的未成熟情況。《古事記》中有記載，應神天皇的時代王仁從百濟把《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帶到倭國，但是，因為《千字文》是南朝梁（502—549）的武帝命文官周興嗣寫的文章，與時代不相符，缺乏可靠性。倭國的漢字使用情況在佛教傳入之前不斷繼續著。如果那個時代帶來《千字文》的話，不是後世所說的《千字文》，可以解釋為千字的漢字以什麼標準匯集的書籍。

5 世紀後半期至 6 世紀前半期地方豪族中也推廣了漢字。例如，稻荷山古墳鐵劍、江田船山古墳太刀銘可以看出接受漢字的痕跡。江田船山古墳太刀銘可見太刀的製作者「張安」的記述，至此的漢字文章幾乎都是出自從中國入籍的住在日本列島的中國人、朝鮮人之手。筆者認為當時只有豪族、王族的周圍使用漢字。為何有此想法呢，因為至那個時代包含倭語的金石文僅有少數，完全沒有木簡、冊頁、絹本等出土文物。作為生活工具使用漢字的習慣在考古學遺物中不被承認。看到視為磐井墳墓的岩戶山古墳的石人石馬、視為繼體天皇墳墓的今城塚古墳的蒼然排列的明器群，以石人石馬、明器來表現自己的世界觀。從這些可以想像文字沒有作為生活工具普及的社會。如果漢字普及的話，與周代同樣古墳中至少應該出土一些漢字資料。末期古墳中雖然王週邊的一部分知道漢字，但是墳墓中沒有放埋葬者的墓誌銘，這是一個疑問，但這表現了對於漢字與我們現在觀念的不同。7 世紀末墓誌銘的出土是在佛教傳來以後，應該考慮是受到佛教和中國、朝鮮墓誌銘的流行的

影響。上述表現了日本列島的漢字狀況，可以認為是《隋書·倭國傳》「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的記載情況。

八. 佛教的傳來和漢字的普及

關於日本佛教的傳來，有權威的學說是 552 年和 538 年的兩種說法。但是，不難想像佛教在這以前已經作為個人信仰由舶來人帶到日本。

《日本書紀》有：欽明天皇 13 年（552 年）10 月百濟的聖明王派遣西部姬氏達率怒喇斯致契奉上釋迦佛金銅像一尊、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的記錄。另外上表，講述廣泛禮拜佛之功德，推進日本列島的國王歸心於佛教。《日本書紀》：「是法、於諸法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辯、無上菩提」是引用《金光明最勝王經·壽量品》：「是金光明最勝王經、於諸經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聲聞獨覺所不能知、此經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辯、無上菩提」的文章，因為《金光明最勝王經》是 700 年代初期由唐朝義淨翻譯的，也有判斷 552 年學說不可靠的學者。

《上宮聖德法王帝說》（824 年以後完成）、《元興寺迦藍緣起並流記資材帳》（724 年完成）記載，欽明天皇的「戊午年」由百濟的聖明王傳來佛教。但是《日本書紀》記載的欽明天皇治世（540 年—571 年）不存在「戊午年」的干支，所以也有欽明天皇以前最近的「戊午年」538 年（根據《日本書紀》是宣化天皇 3 年）是有權威的說法。現在以兩書中共同的「戊午年」為 538 年的說法最有權威性。

總之，佛教的傳來如果是 600 年前半的話，與其相應把佛教傳到日本列島的朝鮮人、學習的日本人為了掌握佛教的教義而學習漢字大體上是事實。日語中存留多數吳音也受到佛教傳來的很大影響。

吳音是漢音傳來之前從南朝（宋、齊、梁、陳）傳來的漢字音。5、6 世紀引入日本，一般地來說，南朝的長江下流的發音直接或者經由朝鮮半島的百濟引入的，其發音不只是長江流域，表示中國整體的漢字的古代系統發音。關於吳音是否確實是南方系統的發音，沒有證實的史料。從朝鮮半島的百濟佛教等多數文物流入日本時吳音也一起流入。像以對馬音、百濟音的別名來表示的那樣，古代日本人考慮吳音是從朝鮮半島傳來的。吳音在佛教用語、律令用語中多數使用，之後漢音引入後也沒被驅逐，至今還在並用。《古事記》的萬葉假名指出了使用的是吳音。

漢音在南朝（宋、齊、梁、陳）結束，源自隋代以後由遣隋使等帶進的漢字發音。南朝隋代滅亡，北朝的隋唐統治整個中國。唐朝吳音不能理解，日本也有必要學習唐朝使用的漢音。在漢字的正宗中國，唐音在整個中國使用時吳音消失，隋唐音（漢音）成為通用語。

同樣漢字的吳音和漢音的讀法如以下一覽表：

漢字	吳音	漢音	漢字	吳音	漢音	漢字	吳音	漢音
明	myou	mei	正	shou	shei	靈	ryou	rei
兵	hyou	hei	命	myou	mei	京	kyou	kei
文	mou	bun	客	kyoku	kaku	役	yaku	eki
力	riki	ryoku	行	gyou	kou	言	gon	gen
金	kon	kin	品	hon	hin	氣	ke	ki

衣	e	i	白	byaku	haku	家	ke	ka
---	---	---	---	-------	------	---	----	----

一覽表中發現，現在多數使用吳音。可理解為吳音先流入日本列島固定後漢音流入。

九. 書法用具和木簡是漢字普及的證據

《日本書紀》的推古天皇 18 年（610 年）：「高麗王貢上僧曇微法定、曇微知五經、且能作彩色及紙墨、並造碾磑」，由此可看出紙、墨的傳來情況。有紙、墨當然也有硯台、毛筆，或許當時已經從中國或者朝鮮半島引進過來。發現平城京出土了大批硯台。

視為日本最早的考古資料的木簡是大阪市中央區難波宮跡出土的木簡，用萬葉假名寫的和歌「皮留久佐乃皮斯米之刀斯」。發現地點是難波宮的西南角，為營造宮殿填拓的山谷，視為 7 世紀中葉之物。因為難波宮是 652 年完成的，推測是其前後之物。另外，在難波宮跡發現了 7 世紀中葉的日本最早的木簡。此木簡是為營造難波宮從填拓的山谷中發現的。木簡推斷為貨簽木簡，表面記載有「斯斯一古」「（肉）一籠」。筆者考慮以木簡的出土為漢字普及的根據。

十. 漢字的普及從何時開始

筆者考慮普及的漢字首先不能缺少書寫工具。沒有書寫工具如何掌握漢字呢。難以考慮在沙子上寫而掌握漢字。如果漢字普及的話，一定有像木簡那樣的當時有關事務處理的文字的出土出現。因為鏡、刀的銘文有中國人、朝鮮人的舶來人理解漢字的話很容易製作，有了這些漢字就能流通，這只不過是想像。筆者認為並不是如此。王及王身邊的人大概知道銘文的意思，但是只是知識非常有限，沒有豐富的漢字正體的知識。

進入 7 世紀，各處可以看到《法華義疏》（615 年完成）、穴太廢寺出土瓦「甲寅年（630 年）」等漢字的考古資料，7 世紀末木簡、墓誌銘（金屬銘板）多數出土。這是漢字在社會上作為流通工具開始使用，說明和 6 世紀以後佛教的引入有極大關係。至此只有擁有理解中國、朝鮮漢字的舶來人的王族週邊之人使用漢字。正因為如此，在這以前時代的木簡、冊頁、絹本之類的考古文物沒有出土。

由此考慮，日本列島的漢字 6 世紀前半至 7 世紀前半是導入時期，從 7 世紀中葉開始事務性使用漢字是官員不可缺少的修養。對漢字的普及給予極大影響的是佛教的傳來，當時朝鮮半島漢字的普及也促進了日本列島的漢字普及。把《魏志·倭人傳》及王仁帶來《千字文》和《論語》、或者倭武王奉與宋朝的上表等，作為漢字普及的證據的看法，不能信服。

從 6 世紀前半是如何學習漢字的，至今不太清楚。610 年曇微舶來之後開始使用日本製造的紙墨。曇微以後使用筆墨紙、還是木簡流通，因為沒有證據不能判斷。《日本書紀》皇極 3 年（644 年）：「後恐他嫌頻接、而俱手把黃卷、自學周孔之教於南淵先生所。」《藤家家傳》卷上：「嘗群公子咸集于旻法師之堂、講周易焉、大臣俊至、鞍作起立、抗禮俱坐。」如果這些史料真實的話，他們不寫漢字而學習註釋，還是使用筆墨、紙、木簡書寫漢字而學習呢，這令人感興趣。

7 世紀中葉木簡出土，能夠開始驗證漢字普及的證據。筆墨紙硯的普及也對應木簡的流通能夠得到驗證。在此之前佛教、儒教的經典從百濟、高句麗帶來，伴隨著漢字的導入期，只有少數一部分人學習漢字，6 世紀前半不是漢字的普及期而應該看作是導入期。

《舊唐書·日本傳》關於唐代開元(713年—741年)初期遣唐使的記述中有:「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此時期日本盛行購買中國書籍。從《日本書紀》創作年代是720年來看,說明為整理國家的歷史而學習漢字及其漢字的意思、使用事例是當務之急。此時期日本人對於漢字使用的技術水平有了飛躍的進步。

結語

《宋書·倭國傳》中記載倭王武上表是在順帝昇明2年(478年)。冒頭記載了有名的文章:「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可見極其高度的漢字熟練程度。由此可知當時倭國王是理解漢字的。但是有些不合情理。如果當時的倭王熟練掌握漢字的話,寫有漢字的木簡為何沒有出土呢。倭王怎樣學習漢字的呢,在沙子上描畫漢字嗎。

比如說,不會說英語的老太太。老太太想給以前在日本認識的美國人寫信。但是老太太不會說英語,跟住在鄰居的美國的Mary用日語講了想寫的內容, Mary翻譯後用英文寫了文章。Mary是在日本的大學教英美文學,自己也創作英文詩等。那麼,老太太的信馬上成為有名的文章。也可以考慮倭王武的上表也是在同樣情況下寫的。

漢字的普及以木簡為開端是筆者的基本想法。因此漢字的普及可看作為7世紀中葉。在那之後飛鳥京、藤原京、平城京大批出土木簡,硯台也多數出土。關於木簡出土以前的倭國人的漢字,像稻荷山古墳鐵劍那樣的紀念物是舶來之人製作的,接受鐵劍的倭國王只是聞知漢字之意,對於漢字的知識的修養不會很高。

參考文獻

- ・倉野憲司校注『古事記』岩波書店(岩波文庫)、1963年1月第1刷發行
- ・井上光貞監訳『日本書紀』中央公論社、1987年11月
- ・石原道博編訳 新訂『魏志倭人伝』他三篇—中国正史日本伝(1)、岩波書店(岩波文庫)、1951年11月第1刷發行
- ・岸俊男編『ことばと文字』日本の古代14、中央公論社、1988年3月

王敏 中國教育部

PPT 資料當場發佈